

“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吕思勉历史教学中的空间观念

■ 裘陈江

“吕先生一生从事文史的教育工作，与一般教育工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教师生涯是从小学开始，进而中学，后来才进入到大学任教。”历数吕思勉一生的著作，除了四部断代史以及《读史札记》等著外，绝大部分均是教科书。

在强调跨学科的当下，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落实“空间观念”的培养，吕思勉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值得进一步挖掘。



▲ 吕思勉31岁时照片及背后不可以貌取人的自传



“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就毋庸在此赘述，而讨论其历史教学实践中的“空间观念”，则须从其史学研究及治学方法谈起。张耕华教授编有《学史门径详说》一书，汇集吕思勉一生最重要的有关读书、治学的文字，读来亲切朴实，可谓“金针度人”。比如吕思勉晚年多次提过一句名言：“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其原意是指“读书先要知道书上所说的，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将学问与社会相联系，主张“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就此一点，与现今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时空观念”的要求也相契合，即在认识现实社会时，能够将认识的对象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考察。

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中，地理一门隶属于史部之下，是“历史附庸”。吕思勉是治旧学出身，故反过来理解，这或许也使得他天然能注意到地理及其包含的“空间观念”对史学的价值。吕思勉年轻时向往“经济之学”，故治学“初从水利工程悟入，后推诸军事，尤见为然；……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

推求其所以然；亦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因此对地理一门尤为热衷。如其在《读旧史入手的方法》一文中细举“治古史的前提”，就史部书目分别而论时指出：“惟地理一门，知其大概，亦颇切用。昔人于此，均先读《读史方輿记要》。此书之观点，太偏于军事，然在今日，尚无他书可以代之。”对于旧史中地理之学的局限，吕思勉在他处也略有展开，认为旧的“地理之学从前多偏政治军事方面，故其多取材于历史，而其取材又多偏重战事”。不过在今日看来，可能也正是由于旧史中的地理之学多取材于历史，方便旧时史家多能有良好的历史地理的功底。

然而吕思勉毕竟不是旧式学者，作为实践启蒙“新史学”的代表之一，其在具体讨论地理与历史的学科关系时，已经有了许多现代的眼光。抗战前夕，吕思勉不仅在大学讨论历史与地理学科的结合，在初中教科书中也指出：

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哪里，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关于前者，宜在地理科中致力。后者宜时时翻阅历史地图。……多读史地图对读几过，似于读史不无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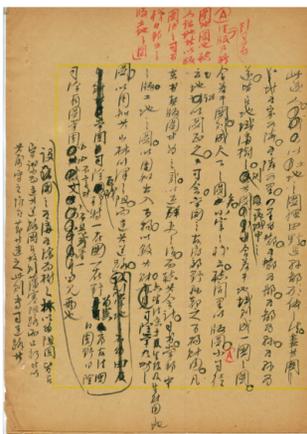
——不仅是提倡，而且已注意到要与当时出版的历史地图相对读的实际操作。

吕先生多次提出，方法不是空讲的，因此在史学研究的实践层面，也有丰富的案例可以看出其重视并受益于“空间观念”。吕思勉1941年在《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起》中回忆称：“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报社讲元史，我曾亦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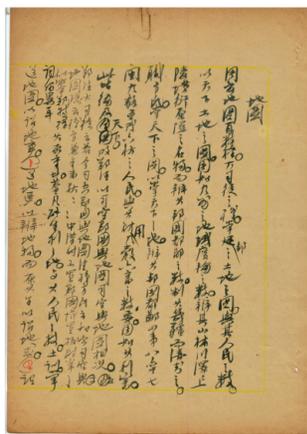
族问题，导源于此。”故以其民族史研究为例，略作阐发。吕思勉治学以博通为世所瞩目，如其在讨论历代民族迁徙、交融时，便往往有极宏伟的议论，往往得益于广阔的空间观念。如在《中国民族史》开篇的总论，谈北派、南方，继而说汉族所在之地“川原交错，物产丰饶，幅员广大，交通便利，气候亦具寒热温三带，取精用弘”。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论述历史上中国北、中、南三带的变动差异，以及讨论近代中西交通的开端等问题时，也均体现空间观念对其历史研究风格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中讨论“中西交通之始”，首先便从自古中国通向欧洲的陆地通道开始讲起，寥寥几百字便将自古至今中国通向欧洲的四条陆地通道的走向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描绘清晰，宛如一幅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地图缓缓在读者眼前展开。

“注重天然与人事之关系”

2016年，李永圻先生在为《吕思勉国史课》撰写序论时指出：“吕先生一生从事文史的教育工作，与一般教育工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教师生涯是从小学（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开始，进而中学，后来才进入到大学任教。他教过的科目，自以历史为最多，除历史之外，还教授过国文、地理等。”而历数吕思勉一生的著作，除了四部断代史以及《读史札记》等史著外，绝大部分均是教科书，涉及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国文、地理、修身等。据李氏统计，吕思勉编纂出版的中小学



▲ 吕思勉谈“地图”札记



均为张耕华教授提供

教科书有十六种，算上学校油印和学生记录的讲义还有七种，因此合计有二十三种，其中历史类的有十四种，地理类的两种，“在民国时期，乃至今日的学术界也是很少见的”。因此，本节拟从吕思勉所编教科书及其教学实践中鲜明地点出了该书九条特色，其中多条反映了对于小学生空间观念，乃至家国情怀的培养目标。其中第一条尤为直截了当：“注重天然与人事之关系，常以自然地理说明他种现象”，着眼的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此后几条中，又提到“注重边防情形，以启发其保卫国家之观念”“租借地及割让地，皆特立一章，以激扬其国耻观念”“本国地理与外国地理互相联络，未复置我国在世界之位置一章，俾收统括之效，益发扬其爱国之心”。可见从立意上远非为小学地理教科书所限，在体现了吕思勉通过地理教学，研讨“天然与人事之关系”，启发民智的关怀。

至于历史教科书，则“空间观念”的案例更为丰富。1937年7月，吕思勉在商务印书馆推出《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在“编辑者言”中，他提出：“初中学生读历史，实在只要知道一个轮廓，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而紧接着所举的案例便反映了其对学生“空间观念”素养的要求，他以埃及尼罗河为例，认为受过初中历史教育，“总记得这条河是在非洲的北部，决不会误以为在欧洲在亚洲，而河流与文明的关系，与最古文明的关系，他也就还是了解的。如此，这个人的书，就算是白读了”。

此外，在讨论春秋五霸时，其又独特地关注到五国崛起的地理位置，均为当时边陲地带。书中称：“东周时代，大国都在沿边，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当时的二等国，如鲁、卫、宋、郑、陈、蔡等，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习于苟安，所以其民渐流于弱；晋、楚、齐、秦、吴、越等国，都居于边地，却以竞争磨砺而强。而且边陲之地，都是旷废的，易于开拓，所以幅员也广大了。”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提倡的注意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联系，主张“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所示，如今历史学科“时空观念”的培养过程中，不应仅限于将史事放入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框架中加以精确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培养时空联系意识和思维方式，进而建构历史关联，对史事作出合理解释。我们从吕思勉的教研实践中，恰好可以汲取不少落实“空间观念”培育的经验和养分。（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清话

『勿长时间看而不买』

——日本的其中堂书店

■ 尹敏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银铛入狱，其藏书充公，现多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由于未单独编目，被当作普通本处理，遂如涓滴细流散入大海，窥其全貌不易。其中旧藏洋装书，已有周运先生的梳理（见《乘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线装书则未见系统勾稽。近日翻阅谢冬荣先生整理的《知堂古籍藏书题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注意到日本嘉永六年（1853）星文堂等刻《醉古堂剑扫》上，有知堂两则题跋：

此书在日本甚通行，与《菜根谭》同为人所爱读，但在中国则似久逸，素未闻有人谈及也。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从名古屋其中堂书店买得此本，二十五日重订论，题记于北平之若茶庵，岂明。

书中颇有“违碍”字句，在前清或是禁书，但书目上不见。又记。

《醉古堂剑扫》十二卷，明陆绍纾编，其人生卒年不详。此书乃分门别类，抄撮各家逸语奇句而成，属于“文抄公”之鼻祖，无怪知堂对其青睐有加。知堂有搜集清代禁书之嗜好，还曾撰文讨论。其实，北平图书馆藏有《醉古堂剑扫》天启原刊本，知堂未见，故有“在中国似久逸”之语。

翻阅知堂日记，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月二日，知堂向名古屋寄去书费10.5元，同月二十三日“上午遣人往取其中堂寄书四部”。而《醉古堂剑扫》题跋言“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从名古屋其中堂书店买得此本”，可知其中堂寄来的四部书中包括这部。从付完款到收到书，耗时不过三周。当时北平文人从日本买书，竟比今天通过海运购买日本古书还要便利一些。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的其中堂，是

上世纪日本最重要的汉籍书店之一。1935年，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郑振铎的最大买书对手）书林点将，列举日本最重要的四家汉籍专门书店：文求堂、琳琅阁、松云堂、山本书店，全在首都东京。另外还有三家书店，长泽认为虽称不上汉籍专门书店，但库存丰富，也能买到优质汉籍，分别是东京的浅仓屋、大阪的鹿田松云堂、名古屋的其中堂。（长泽规矩也《贺疑丛答》，《书志学》第2卷第5号，1935）

长泽是土生土长、性格倔傲的东京公子哥儿，远在日本名古屋的其中堂能入他的法眼，必有其长处。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长泽写道：

说到“看而不买”，名古屋门前町有一家叫其中堂的气派书店，从不把书摆在店头，而是在门口竖着“时间就是金钱”“勿长时间看而不买”字样的看板，每年正月发行的书目里，也印上这两句话。心想一定是家难搞的书店吧，但见到店主，发现也可以闲谈。没有任何异样之感。后来店主为了修业，来琳琅阁当伙计。性格那么好的人，战后就再也见不到了，真令人惋惜。京都其中堂的老店主，是这位店主的弟弟。（长泽规矩也《收书遍览》，《大安》第11卷第7号，1965）

长泽规矩也未提及其中堂书店店主的姓名。据《日本古书通讯》第127号报道，其中堂书店店主三浦兼助已于1940年1月15日去世，与文中“性格那么好的人，战后就再也见不到了”相符。长泽描述的，是二战之前其中堂书店“两京并立”的黄金时代，其本店位于名古屋市中区中区门前町，店主是二代目三浦兼助；支店位于京都市（西京）寺町通松原北，店主是三浦

良吉，即兼助的弟弟。

行文至此，有必要普及一个基本知识：在日本江户时代，很多商铺主代代袭名，称一代目、二代目、三代目，将人名作为一种商业资产继承，犹如今日之商标。其中堂书店一代目店主名为三浦兼助，名古屋人，生于安政三年（1856），卒于大正六年（1917）。六十岁退隐后改名三浦在六，又称在六居士，将三浦兼助之名让与长子，后者即二代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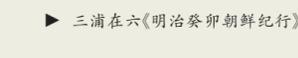
明治三十六年（1903），一代目三浦兼助去朝鲜游历，他后来在《明治癸卯朝鲜纪行》一书中自序：“以购买古书为目的渡朝的外国商人，以仆为嘴矢”。此行“第一为买收朝鲜古本，第二为观察新刊书的销路。同时在四国、九州地区搜求古书”。抵达朝鲜后，他不但购入《高丽史》等珍贵典籍，还拜访京都本愿寺的井上香宪、京城本愿寺的青山知道，了解海外布教情况。由此亦可推察，三浦家应是佛教净土真宗的信徒，其中堂主要售卖佛教书籍或与此有关。

作为地方书店，其中堂一方面利用地利，早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前，就从西日本以及朝鲜半岛购进古书；另一方面克服区位优势，在京都开设分店，吸引外地甚至海外顾客，积极发展邮购，拓宽销售渠道。独特的货源与经营策略，吸引了国内高端藏家的目光。德富苏峰曾云：

记得当年五山版的禅语语录等书，每册价格在五至十日元之间。除了琳琅阁外，我还在大阪的鹿田松云堂、京都的若林春和堂、名古屋的三浦书店“两京并立”的黄金时代，又数从东京的琳琅阁、大阪的松云堂买得最多。（《典籍清话》，民友社，1932）



▲ 其中堂书店一代目店主三浦在六



▶ 三浦在六《明治癸卯朝鲜纪行》

五山版的价值堪比宋元版，战前价格还不高，其中堂也有所涉猎。周作人从其中堂书店购买的，则是更为廉价但中国罕见的江户时代和刻汉籍。另外，李小龙教授还注意到，鲁迅也在京都其中堂书店买过书：“其中堂位于寺町通，据说此书店原在名古屋，后来转到京都。在寺町通这样的核心地点，其店面之宏阔疏朗，实在令人惊叹。”（《书舶录·日本访书记》，三联书店，2019）稍可补充的是，鲁迅在世时京都其中堂书店不过是支店，二代目三浦兼助过世后才升级成为本店。

现有资料显示，鲁迅从其中堂买书早于周作人，不能排除二弟受大哥影响的可能性。据《鲁迅日记》，1921年2月3日“寄日本京都其中堂信并泉四元四角购书”，2月19日“上午得其中堂书店来信”，5月30日“寄其中堂信并泉三元四角”。推测“来信”的

授课实践中，也有非常生动的实例。史学大师钱穆是吕思勉在常州府中学堂所教的学生，钱穆晚年《师友杂忆》中声情并茂地回忆了吕思勉的授课情形：

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这与前一节吕思勉提示舆地典籍与历史地图对读可相互印证，在课程测试中，吕思勉出了四道题，钱穆对其中“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尤感兴趣，答题时“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而吕思勉批改的情况，则有同学窥探后所述为证，钱穆记下：“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吕思勉字）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钱穆自道这是吕思勉为人师的可爱之处，但从出题本身以及钱穆回答如此引起吕思勉兴趣，可以推想吕思勉在教学中对于“空间观念”的着意培养和兴致所在。

综上所述，吕思勉先生一生未脱离历史教学的一线，其史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皆能以空间的变迁来解释历史的嬗变，故视野宏大，令人产生一种跳出地平线的立体感。其主张“学问在空间”，强调阅历经验与书本知识的汇合，一方面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另一方面也是如今重视田野考察、行走历史的原意。

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提倡的注意人类历史与自然界的联系，主张“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所示，如今历史学科“时空观念”的培养过程中，不应仅限于将史事放入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框架中加以精确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注意培养时空联系意识和思维方式，进而建构历史关联，对史事作出合理解释。我们从吕思勉的教研实践中，恰好可以汲取不少落实“空间观念”培育的经验和养分。（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内容，应是《其中堂发卖书目》。1923年2月7日，鲁迅“晚得其中堂寄来之左啻《三余偶笔》八册、《中箱小品》四册，共泉三元二角。二弟亦从芸草堂购得佳书数种”。2月26日“下午其中堂书店寄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值亦十元。”以上三部书，皆有江户时代和刻本。

1929年3月21日，鲁迅“得其中堂信片”，从中选购若干种，4月5日“其中堂寄来《因树屋英华》《百喻经》各一部，共泉六元四角”。这可能是鲁迅最后一次从其中堂购书。他从没有亲自拜访过名古屋或者京都的其中堂书店，一直通过目录邮寄购买。鲁迅还从丸善书店、相模屋、文求堂等东京书店购书，直到1927年遇见上海内山书店，成为那里的常客以后，才逐渐停止从日本购书。（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